

DOI: 10.16366/j.cnki.1000-2359.2022.05.12

市场合作、民间协调 与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模式创新

——基于联村党建实践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咸鸣霞,周义程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我国农村百年发展史表明,基层自治模式是草根民主带来发展奇迹的实践典范,基层党建模式贯穿于农村社区由国家统一管理至自主治理的资源整合过程之中。作为基层自治的组织结构创新模式,联村党委机制不仅是村界联合,更是资源整合下的治理联合。从中国本土化实践来看,市场合作和民间协调共同嵌入基层党组织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农村资源整合机制。根据市场合作和民间协调变量连续统的变化,基层党组织的资源整合分为“村村抱团型”“强村带弱村型”“资源互联型”“产业牵引型”四种模式。四种资源整合模式以及联村党建典型案例的实践表明,联村党委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基层自治的组织结构创新模式,利用该机制可以提升党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不断优化整合农村资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联村党建;市场合作;民间协调;资源整合;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咸鸣霞(1992—),女,江苏常州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政府治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基层治理与体制改革等相关研究;周义程(通信作者),男,江苏泗阳人,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服务、基层治理等相关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YJCZH19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项目(NH33710921);苏州大学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项目(ISX10200118)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2)05-0090-09 收稿日期:2022-02-05

一、问题的提出

自进入农业经济社会以来,村庄治理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以来,村庄治理结构遭遇第一波现代化冲击,城乡二元体制下推进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的封闭性被打破。第二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制度实践对现代化冲击予以回应,从根本上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进行改造与重塑。第三阶段是20世纪中叶以来,在前期互助合作的基础上探索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关系,有效密切了农民与新成立国家的关系,但仍是采取总体性治理的发展模式。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基层实践深入发展下的乡村建设运动。在第三阶段的计划经济时代向第四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基础流失,国家退出对乡村治理的统一性调配,转向村民自治性管理。在乡村振兴与乡村建设政策引导下,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藩篱”虽然被逐渐破除,但在当前自发性市场为动力的战略环境下,资源要素由城市向农村单向度的汲取为主,农村治理主体与治理结构等资源要素空心化现象仍较为突出。在以上实践场景的四阶段转换历程中,治理主体的分化、治理结构的碎片化对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层管理规则、

组织建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农村治理资源的整体性短缺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治理运行的首要难题^①。市场、社区与国家之间的目标差异以及资源协调困难是当前村庄发展困境的内在根源^②。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承担着农村社会整合的重要职责,掌握动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资源^③。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区资源整合中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影响深远。那么,农村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的实现机制是什么?“解决三农问题,既在农村之外,也在农村之旁,还要返回农村之中。”^④这里的农村既可以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行政村,也可以是有效运转的自然村,还可以是联合村。从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到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践转向,根植于中国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组织形态以及乡村内生性组织密切相关。这与西方社会提倡的以资本形式运作不同,也与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分析视角有一定的区别。概言之,党建引领下资源整合力的生成是乡村全面振兴、高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中国典型实践。

二、理论逻辑与研究框架

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不仅为统筹城乡发展和纵深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出了要求,更为“跨村联动”下乡村融合共进、不断提升村庄的内生发展指明了方向。联村党委机制作为基层治理的创新载体,其通过获取外部资源和激发内生动力,以期实现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双重整合。现有研究主要从组织间联合的表现形式、运行现状和结果等方面进行关注,对联村党组织内在运行机理的探索性研究不够。有鉴于此,有必要基于中国治理的本土情境,研究构建“市场合作—民间协调”二维分析框架下联村党委资源整合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农村资源整合模式进行类型学划分。

(一)理论研究进路

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幅员辽阔,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涉及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农村之外”即运用市场化力量的资金、技术、服务等要素,“农村之旁”即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治理主体——农村基层社区及其党组织,“农村之中”即基层社区中的精英治理等民间协调力量。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下依靠市场和技术的整合不同,中国基层社区协同治理主要依靠“以党领政”治理结构下党的制度整合力^⑤。

从党组织整合到联村党组织,遵循了政治与治理的双重整合逻辑。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镇党委的基层派出单位,以村支部等党组织为构成主体。当前对村党组织的整合多见于城乡党组织之间的组织联建,以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基层党建格局为目标。联村党组织的内涵主要包括村支部联合的范围、目的以及形式等。从当前实践开展来看,村民、村情和村域等地理位置分布是基层农村党组织联合的主要依据和范围。基于相对集中的村民分布、相似的村情村况和相邻的村域村界等进行党支部联建,可实现生产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地域村情或产业发展相匹配的村庄中发起联合决策。然而在各地集体的发展中鲜见联村党组织实效性的相关阐述,更多的仅为阵地共用、服务资源共享等简单“糅合”,不存在一致的核心利益诉求^⑥。政治逻辑下法定权力与治理能力的有机统一是基层党组织治理权能发挥的重要因素^⑦。立足组织再造理论,可以发现从党组织整合的结构创新到联村党组织的机制创新,实现了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整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组织资源。

从区域化党建到联村党委机制构建,探索了外部资源获取与内生动力激发的双重整合路径。在具体实现层面,基层党建的机制构建过程主要体现为从以党支部联建为核心的区域化党建向以资源连接为基础的

① 王文彬:《农村基层治理困局与优化路径:治理资源运转视角》,《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② 叶敏,董佳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景区型村庄:发展逻辑与治理困境:基于浙江W镇JL村发展经验的案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③ 姜裕富:《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研究: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

④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10页。

⑤ 李晓燕:《社会动员的双重逻辑:社会理性和精英治理》,《党政研究》,2020年第5期。

⑥ 蔡新燕:《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的实践与思考: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⑦ 王浦劬,汤彬:《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威塑造机制研究:基于T市B区社区党组织治理经验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

联村党委制度设计的转变。区域化党建以党组织为核心,以资源、服务和事务等为纽带,建立村民、党员、村干部、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的相邻村域共同体。当然,区域化党建一定程度上仍属于集体行动理论的解释范畴,其理论假设为参与行动的主体之间不存在身份地位差别,仅凭借“自我履约”等个人理性实现集体行动,由此可能陷入有限理性人假设下的集体合作困境。当前区域化党建主要表现为松散、机械的联合体,缺乏资源链接的深度整合,多为村庄党支部的机械联合。联村党委作为制度创新载体,在资源整合机制方面开展了有益探索,但就实践推进来看,目前达成的共识主要为:党委搭建协商合作平台,干部下沉有效回应村级治理公共性的缺失,有序推进党组织建设工作^①。就理论研究来看,大多聚焦于对基层党建引领下的村庄合建、村企合建等的实践经验进行归纳分析,围绕联村党组织运行机理和治理机制的探索性研究不多。

资源整合作为异质性资源集合、处理与优化的新型理念,多见于供应链物流管理、业务流程再造等企业管理领域,一般多作为促进学习过程的机制,与开放创新、企业绩效等关系甚密^②。这与联村党组织面临的多重主体、多维目标等组织资源协调与组织性互动关系的建立具有较强的契合性。资源整合过程主要包括对要素的识别(选择)、汲取、配置和激活利用等环节。其中,资源整合的关键要素包括作为显性要素的利益整合、作为隐性要素的社会关系整合和作为共享要素的制度整合^③。资源整合既包括面向组织外部的行为,又包括内在资源的组合配置和使用行为^④。资源整合的动力主要有借助传统、交换协调和行政主导三种类型^⑤。从村庄治理空间中资源整合的动力源来看,主要包括:作为核心引领者的基层党政组织,其拥有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权威和区域资源统筹能力;治理主体间的横向市场合作组织,其拥有乡村发展的技术或市场资源;联合村域中的精英、乡贤等民间关键行动者,其能号召和动员广大村民并获得民间的认可。

(二)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模式的类型学划分:一个理论框架

学者大多从治理视角对农村基层自治模式加以分类,代表性观点主要为张厚安提出的村治三类型说和欧博文提出的四模型说,但从组织与资源视角对于基层党组织职能的发挥和运行机制的研究不多见。依据资源管理理论对整合倾向性的划分,资源整合方式主要包括对现有资源结构予以组合配置的稳定型资源整合和以创新组合配置的开拓型资源整合两种类型^⑥。本研究基于中国本土化治理情境,提出通过“市场合作和民间协调嵌入党建制度整合”来构建基层党组织的新型资源整合机制。农村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建立在民间协调的认同性和发展性等方面。这个过程既包括社群成员的关系互动,又包括资源与权力的交换与相互依赖。根据市场合作和民间协调这两个维度发展的连续统变化,尝试构建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的类型学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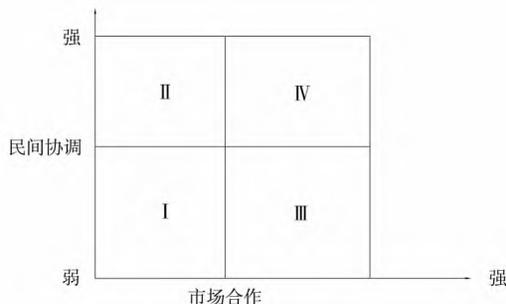


图1 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的类型学建构

如图1所示,在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的类型学建构中,X轴为市场合作,Y轴为民间协调。联村党委的资源整合原则不仅要关注村民、村情和村域地理位置分布等自然要素,还应对资源、产业、交通等人文社会要

① 陈亮,李元:《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探索》,2018年第6期。

② T. Russo-Spena et al: *Innovating in Practice: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s*, Springer, 2017, p244.

③ 孙彩虹:《协同治理视域下政府资源整合与组织能力分析: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④ 董保宝,葛宝山,王侃:《资源整合过程、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机理与路径》,《管理世界》,2011年第3期。

⑤ 邱柏生:《论社区资源类型及其整合方式》,《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6期。

⑥ 孙秀梅,高德芳,宋剑锋:《创业者行业经验、资源整合与商业模式创新性》,《华东经济管理》,2021年第5期。

素予以考察,寻找联村组织中各村资源的连接点。从要素整合角度来看,农村市场合作行为主要基于引进项目等外来资源,民间协调主要基于农村土地、劳动力等内生资源,而这两类要素的资源整合则主要基于党建制度。根据这两个内在与外在的资源整合维度,可以将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分为四个象限,并根据不同资源连接点力量对比进行命名和分类(见表1)。

考虑力量对比下的联合模式,主要有“村村抱团型”“强村带弱村型”“资源互联型”“产业牵引型”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划分主要依据联建村庄的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等前置性变量和关键行动者等民间协调力量的要素组合差异。其中,村村抱团型以地理区位因素为主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乡村发展前置性变量的松散组合;强村带弱村型通过强带弱实现示范帮扶,但是对内在动力机制缺乏有效引领,呈现为有限的相互依赖关系;资源互联型在项目产业基础上对村庄本土资源予以整合,但仍以乡村资源禀赋为主,对村庄内在资源与外在产业市场把握不足;产业牵引型有效实现了关键行动者等内生变量与外在市场合作主体等利益联结的有机结合。

表1 基层党组织不同类型资源整合的构成要素与特征

整合类型	市场合作	民间协调	资源链接点	链接类型
I型:村村抱团型	弱	弱	地理区位等前置性变量为主	村落共同体
II型:强村带弱村型	弱	强	关键行动者引领等民间协调力量为主	政策共同体
III型:资源互联型	强	弱	资源禀赋等汲取性变量为主	地域共同体
IV型:产业牵引型	强	强	项目等市场要素与关键行动者为主	产业共同体

1.“弱合作—弱协调”的村村抱团型。在该资源整合模式下,联建村庄以地理区位邻近等前置性整合变量为主要链接要素,也导致了横向主体间的合作与纵向关键者的协调均不足。因二者之间资源整合效应的缺失,该模式仍以弱物理链接为主要表现方式。在现实发展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规模效应下的村庄经济社会发展,但各村各自为政的现象仍较为突出,各村产业发展“貌合神离”。在该资源整合模式下,村干部等主体并不能成为整个联村组织意志的代表,因而不能对整个村社关系网络具有谈判力和动员力,从而出现村庄“治理无主体化”与内生动力激发不足、资源连接不够等隐性发展掣肘^①。

2.“弱合作—强协调”的强村带弱村型。该模式以“弱市场合作—强民间协调”为连接要素,以强村中的“经济能人”“政治能人”“社会能人”等关键行动者的引领为主。在该模式中,虽然强村带动弱村发展的落脚点仍是经济发展,但因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横向主体间合作较弱,在现实发展中弱村多为强村产业链条中非关键环节的承接者和转移对象。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被事后问责,那么事先谁也不需要负责任地行动”^②。虽然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弱村经济社会发展,但强村更主要的动机在于试图扩大政治社会影响。该资源整合模式表现为关键行动者引领下较低利益整合的弱物理链接,市场合作与民间协调机制整合性不高。

3.“强合作—弱协调”的资源互联型。在“资本雇佣劳动”背景下,农村社区或多或少存在失地农民、自然资源被贱卖或破坏,农村劳动力过于低廉等市场“有限理性”行为。部分村干部把经济效益作为一切工作发展的核心,最终演变为资本要素的代理人,从而丧失了提供公共服务的管理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功能。虽然说,通过对市场要素与村庄资源禀赋的整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村庄发展,但对民间协调等村庄内生资源缺乏有机链接,该模式仅呈现为弱化链接的特性。此外,基于农村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外部市场力量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获取所需的所有资源,长期发展的动态能力和竞争优势难以保持^③。

4.“强合作—强协调”的产业牵引型。在项目产业等市场要素与关键行动者均占强势地位的环境下,该模式通过制度要素完成了市场合作与民间协调的资源连接整合,从而产生了资源整合的叠加效应。市场合作等因素不但是产业牵引发展模式的外在主导因素,而且是乡村发展集体行动的直接驱动力量,共同构成了资源整合过程中的显性发展要素;民间协调属于产业发展模式的内生主导因素,是乡村发展集体行动的示范

① 冯川:《“联村制度”与利益密集型村庄的乡镇治理:以浙东S镇M村的实践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2期。

② Bovens,M: The Social Steering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9.

③ Gill,J and Butler,R.J.Managing Instability in Cross-Cultural Alliances, Long Range Planning, 2003(6).

带动和实践引领力量,构成了资源整合机制的隐性发展要素。该模式所内含的资源连接类型是横向产业主体强合作与纵向关键行动强协调所产生的强化学资源连接。

三、案例验证与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路径构建

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模式是介于层级治理模式与市场治理模式之间的自组织治理模式。不过,与企业家政府理论中“掌舵而不是划桨”的理念相似,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如何在完成掌舵职能的同时,使得服务供给方积极承担责任、提升效率。联村党委机制的实质是构建交换资源和协商共同目标“自我掌舵”的网络,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权威对体制内外的资源予以整合,同时使得交换关系惯例化。在对案例进行过程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资源整合模式予以例证演绎,对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力的提升路径进行推演归纳。

(一)村庄联村党建资源整合的实践案例验证

本文对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联村党建案例进行了调研,总结出 10 余个乡村社区实践案例的发展历程和特征(见表 2)。通过归纳乡村资源利用的典型方式和运行特征,提供了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现象的解释方案,同时就四种发展模式梳理典型案例如下:

1.村村抱团型。村村抱团型(编码:ZJ-01)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模式主要根据村庄区位、传统、历史等资源禀赋进行联合管理,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集聚资源获得了规模化发展,但缺乏横向产业主体特色基础上的利益整合,村庄民间协调呈现出多中心、原子化主体的分布态势。如 Y 镇围绕地缘因素对全镇所辖行政村进行联村党委分片管理,设立 4 个联村党委,总联村党委书记由镇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担任,其他委员由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选举产生。其中,ZJ 联村党委对 9 个抱团村庄依据现有区位特征分别打造朱家户美食美宿、石井河休闲采摘、姚南峪村落文化、计宝峪圩子文化、碾砣传统酿造、山水河观光农业和王庄、西白峪樱桃集市等特色产业。

该资源整合模式呈现“弱市场合作—弱民间协调”的要素连接特征,从联村组织成员设置来看,ZJ 联村党委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组织任命,村庄能人等民间协调力量相对不足。从联村产业横向主体来看,各产业主体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多中心松散产业共同体特征,缺乏具有运营经验的产业主体。根据村庄现有的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特征,从资源整合角度对村庄体制内资源和体制外资源的整合力度还不够,资源整合利用程度在不同的村落出现较大的差异。在该模式下,联村党委负责人往往具有“边际人”心态,在处理事务时,不自觉地受所在村庄或组织利益的影响,且因其在产业层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不足,在所形成的村落共同体中威信不够,同时也未突破“村级组织官僚化”这一乡政村治模式科层制带来的发展瓶颈。

2.强村带弱村型。强村带弱村型(编号:LS-03)资源整合模式表现为“弱市场合作—强民间协调”的要素连接特征,就市场合作深度而言,强村对于弱村的辐射范围仅限产业链条的局部,产业发展的联动性不够。就民间协调的广度而言,联村党委的设置多以强村村委为主、弱村村委主要干部为辅,较之于村村抱团型资源整合模式“自上而下”的组织任命方式,强村带弱村型资源整合模式能较充分地利用“经济能人”等民间协调资源。然而,在该资源整合模式中,强村带动弱村发展的动机多为政治动机,缺乏产业主体深度合作下的经济动机驱动,资源整合效果视强村发展决策而定,呈现为单中心半紧密型政策共同体。

如 LS 村是远近闻名的红旗村、富裕村,而周边的东流水、南流水、车场 3 个村缺少发展活力,多年发展没有起色。2019 年 6 月,为带动整个片区发展,镇党委结合“流水锃乡”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指导 4 个村成立“强村带弱村式”LS 联村党委,服务 1474 户、3859 人。联村党委设委员 5 职,全市“担当作为好支书”、强村党支部书记 C 某担任联村党委书记,对片区重点工作进行集体决策,确保各联建村工作齐头并进,带动各联建村 120 余人就近就业脱贫,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3.资源互连型。资源互连型(编码:LT-07)整合主要通过横向主体深度合作与资源的纵深联结,促进乡村经济社会体系化发展,主要呈现“强市场合作—弱民间协调”的资源连接要素特征。如 LT 联村联社根据乡村资源禀赋,组建成立芳草渡有限公司,组织村民进行前期种植,公司负责种植后的收割至销售的环节,此外在种子和农药、化肥等采购方面,公司严格统一货源,并对具体种植环节进行培训指导。与传统分散性种植和种植技术的较为缺乏不同,该联村联社通过提高有机肥料的使用率、部分季节轮作休耕、鸭鱼和稻混

养等手段来提升稻米种植品质。通过党组织和经济组织、社会组织间的有机融合和良性互动,增加了党建合作村的经济收益。

如LT联村联社通过成立组织外生型产业主体开展资源汲取与协调,造成了村庄内生主体资源开发利用的不足。这一做法虽在短期内有利于村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对于村庄发展的长效性不够。LT联村联社虽以产业发展为载体,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采取单一的市场化资源整合方式,缺乏对各村村民内在需求的多样化整合。该资源整合模式主要属于汲取村庄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外在式”发展方式,与改善民生、满足农民发展需求的“内在式”发展路径相比较仍有成长空间。

4.产业牵引型。在产业牵引型(编码:FY-08)整合模式下,联村党委作为自治性与行政性的管理机构,在市场组织、民间力量规范整合基础上,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在具体运行中,各村党支部组织成立农村合作社、产业协会等新型经营主体,以土地流转、劳动力等要素规范产业建设标准和提升产品品质,发展集体经济。如FY凤驿联村党委按照“一村一品”的思路,整合联建村区域扶持政策、资金、土地、人才等资源要素,打造以农家乐为主的中低端乡村旅游品牌“田园柳舍”、主打山地度假的高端品牌“灵龙山居”、以休闲采摘为主题的“凤驿花开”产业园,以及精品民宿“逸品山水”4个档次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旅项目。

联村党委根据村庄发展现状、资源禀赋列出供给清单,企业党组织根据企业发展战略、技术和市场定位列出需求清单,双方在要素整合基础上找寻产业发展、资本增值的结合点。在对村庄现有资源合理利用和系统开发基础上,FY联村党委实施“创客村”建设,吸引“甜小鲜”电子商务、“三斤工作室”等创业团队入驻,逐步形成以产业吸引和培育人才的“虹吸”效应。此外,还在联村内部探索建立资源薄弱的利益分享兜底分红政策。除了高端品牌、精品民宿等产业项目创收外,下柳沟村“田园柳舍”乡村旅游项目作为联村品牌项目中的中低端资源薄弱点,村集体2019年兜底分红3万多元。通过党组织和经济组织、社会组织间有机融合和良性互动,一方面解决了贫困村的贫困户就业岗位问题,增加了党建合作村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也在党组织中有效培养了现代职业农民和经理人。

表2 村庄联村党建实践案例的类型学划分

编码	组织原则	议事制度/决策程序	财务核算	联建类型/模式
ZJ-01	阵地联用、办公联署、定事联商、实事联办	定期召开党委会、联席会	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独立收支	村村抱团型
MY-02	党建工作联办、行业产业联创、党员队伍联培、党群活动联动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独立核算	村村抱团型
LS-03	集体决策	例会、调度会、点评会	谁共建谁受益	强村带弱村型
JJ-04	组织联建、干部联动、产业联营	示范引领、经验推广;区域党建联合体联席会议;强村召集、“轮流坐庄”定期召开	独立核算	强村带弱村型
DZ-05	党建联抓、阵地联建、党员联管和产业联创	党员大会;分级负责、明确责任	独立核算	资源互连型
QO-06	“联村双带”	“一头二翼”联村支部提议、联村“两委”商议、村民大会表决、乡镇党委审定、组织部门批准	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独立收支	资源互连型
LT-07	支部联建、产业联推、服务联抓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独立核算	资源互联型
FY-08	三不变、三独立、三集中	定期召开党委会、联席会	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独立收支	产业牵引型
YC-09	围绕中心、联动五村、聚焦优势	网格化管理,党建指导	参股合作,本金保底,固定分红	产业牵引型
WJ-10	党建统一谋划、发展统一规划、资源统一利用、项目统一实施	支部建立在各产业组织链条上	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独立管理、项目制分红	产业牵引型

(二)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力提升路径分析

与原子化的村庄布局、分割化的利益格局不同,现有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组织力涣散、向心力不足和队伍建设老龄化等突出问题。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组织党建业务与事业发展相分离甚至背离的现象,农村基层治理处于“离散且封闭”的运行状态。如何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党组织对民间协调的内生资源和市场合作的外生资源予以整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治理的

演进,二者呈现不断互动的动态演变过程。党组织资源整合主要基于市场合作与民间协调二者的力量对比,形成四种资源整合模式。然而,四种模式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资源整合过程的演进,资源整合模式间可能会发生转换。基于四种资源整合模式的运行特征和各村的资源禀赋差异,本文提出党组织资源整合力提升的“N型”和“S型”发展路径(见图2)。

1.基层党组织“N型”资源整合发展路径。“N型”资源整合发展路径的第一阶段主要通过民间协调能力的内在提升,实现资源整合模式由村村抱团型向强村带弱村型发展。这两种资源整合模式仍以村庄内生力量为主,其中村村抱团型需要考虑各村联合的意愿程度,强村带弱村型主要基于强村对弱村发展的扶植与推动,需要突出对内生资源协调的整合力。“N型”资源整合发展路径的第二阶段是在前期内生资源协调力提升基础上,通过对市场合作等外生资源的整合应用与相机发展,完成由强村带弱村型资源整合模式向资源互联型资源整合模式的转变。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模式的转变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在民间协调基础上对市场合作等外生资源予以整合,即民间协调与市场合作叠加作用。“N型”资源整合发展路径的最后一个阶段即通过精英治理主导下的民间协调与横向产业主体的深度合作,向产业牵引型资源整合模式转变。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资源整合模式转变的外在动力表现为理性人视角下产业发展的经济利益驱使,内在持续动力体现在村庄内外精英利用自组织网络规制资源的交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源整合的实质则通过培养引领乡村发展的本土精英,增强纵向间相互依赖的成员凝聚力,引领村庄本土精英进行多元主义谈判,进而转向功能性更强的社团主义,同时以产业发展为载体形成广泛的横向联结,最终打造党组织资源整合引领下的村庄产业共同体。该发展路径形塑了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与外部适应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运行机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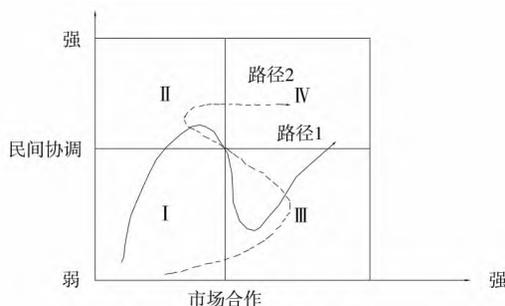


图2 党组织资源整合力提升路径^②

2.基层党组织“S型”资源整合发展路径。资源整合既是组织内部的过程,也是组织之间的过程。相较于“N型”党组织资源整合力提升路径,“S型”资源整合提升路径的着力点为加强横向主体间的市场合作,这契合了经济发展资源整合的首要目标。在该模式下,资源整合路径提升的第二阶段则以产业发展为依托,在资源整合互联中率先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进而取得先行性发展,通过政策引领、强村带弱村等组织内部关系的整合,兼顾了资源整合的经济原则与效益原则。需要关注的是,这一阶段中资源整合模式并不是由资源互联型向强村带弱村型单向度的转变,而是在对资源互联等产业发展基础上,叠加政策引领示范带动所产生的累积效应。这一阶段资源整合模式从加强组织间资源交换等市场合作要素着手,通过对民间力量予以政策整合,然而,如果任何人都不用对民间协调的结果负责,那么强村带动弱村发展的结果则鲜有人持续关注。更进一步地说,实现“自治权力持续表达”的落脚点仍是经济社会效益发展,在实现共同富裕基础上的构建产业共同体,即“S型”资源整合提升路径的第三阶段。

基层党组织“N型”资源整合发展路径与“S型”资源整合发展路径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着力方向的不同。值得关注的是,这里的“N型”与“S型”并不能代表党组织资源整合力的大小,仅作为提升路径发展方向的简

① 曾维和,咸鸣霞:《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1期。

② 路径1(实线表示)为基层党组织“N型”资源整合发展路径;路径2(虚线表示)为基层党组织“S型”资源整合发展路径。

单形象示意。正如罗兹指出的,治理并无所谓的本质特征,仅是由一些相似之处构成的权变混合体^①。两种资源整合发展路径并无优劣,各基层单位可根据自身发展情况相机选择。

四、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建立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对接。这意味着乡村治理不仅要解决经济意义上的温饱问题,更是组织、人才、生态等广泛意义上的乡村全面振兴。联村党委作为一种创新性组织结构,不但挖掘了基层的治理优势,而且实现了治理效能的提升。在对其进行理论演绎和案例推演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党组织资源整合力提升的“N型”发展路径和“S型”发展路径。

(一)联村党委本质上是一种基层自治的组织结构创新

联村党委不仅是村界联合,更是治理联合。农村基层治理之道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集体行动,而是采用了联村党委领导下社群熟悉基础上的互惠机制,其行动主体除了以“理性人”为核心原则的市场合作要素,“熟人社会”下“约定俗成”的民间协调要素,还包括以“集体利益、共享利益”为基本旨归的政治监督要素。在对联村党建典型案例进行类型学分析后不难发现,治理有效的关键并不是互惠机制本身,而是通过正式组织之外的权力结构,实现了基于控制权差异的权威治理。党建引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实施权威治理的可能性。从联村党建的实施主体、发起主体、发展主体来看,联村党委组织并不是新增的管理层级,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村和乡镇之间的“民间”自治联合组织。这种组织形式有效缩短了乡镇管理半径,通过分散式传统服务向行政资源的集中转变,提升了自治效率和治理效能。

联村党委组织机制的实施,应坚持权限规范、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原则。一方面,应明确其职责权限和运行边界,在公共事务上进行统一部署和领导落实,以党组织联席会议的方式进行民主决策,充分保障多主体的利益分享与权利表达。另一方面,联村党委机制通过打通村庄内外资源链,有效丰富与充实了乡村经济发展业态,盘活了村庄经济社会发展。在利益分享机制落实上,联村党委组织建设获得的集体经济收益主要用于村民福利改善、生产扩大资金储备和村组织自身运转经费。此外,在责任共担方面,将联村党委的组织实施成效纳入各级党组织基层党建评议述职考核内容。在人才激励方面,对联村党委中表现突出的成员优先纳入“百千万”工程等人才工程或优先授予劳模等荣誉称号。通过构建困难党员、流动党员、产业党员、普通党员等层次性管理体系,组织参与乡土人才示范培训班等工程,保持村组后备管理力量,在致富带头人等联村党建人才管理存量的基础上,对外出优秀人才做好信息统计,实施农村优秀人才回引的优惠政策。

(二)党组织资源整合能力提升下的村庄发展路径选择

基于中国本土化治理情境,本文提出通过“市场合作和民间协调嵌入党建制度整合”视角来构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新型资源整合机制。该整合机制的内在生成机理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经济理性下市场合作嵌入党委制度整合。通过党建引领与业务经营等具体事务的结合,有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与引导功能。二是精英治理下的民间协调嵌入党委制度整合。乡村精英作为国家与农民互动的中间力量,是社会权力调整和基层治理的着力点,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秩序和培育乡村社会资本等重要作用。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乡村精英作为农村自身的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甚至决定作用,是农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制度决定者”。例如,宁波市奉化区“滕头区域”联村党委构建了村级储备干部互动学习平台,对村干部进行强村挂职培养和结对指导。D村有效拓展村治精英的选择范围,将人选拓展至本村外围,进一步发展了村民自治的灵活性,同时有效破除了“村人治村”的治理局限。该村还通过“田间+阵地+流动”多课堂形式,将培养党组织和农村新型领导骨干落实在经济社会发展具体事务与环节中。XL村党委建立党组织带头人与致富带头人的双向培养贯通体系,一方面将党组织带头人培养为致富带头人,另一方面积极培育致富带头人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并发展进入党组织。三是精英治理主导下的民间协调与市场合作叠加作用,党委通过制度整合对该叠加变量予以调试。就此而言,文化是历史和地域的复数,农村基层治理是市场合作和民间协调的复数,是二者叠加基础上体系化、制度化的转换过程,党委制度整合正是这一“创造性转

^① R.A.W.罗兹:《理解治理:政策网络、治理、反思与问责》,丁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页。

换”的动力。

根据市场合作和民间协调这两个维度发展的连续统变化,本研究构建了“村村抱团型”“强村带弱村型”“资源互联型”“产业牵引型”等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的不同类型。鉴于四种资源整合模式的运行特征以及各村资源禀赋的差异,随着资源整合过程的演进,四种资源整合模式间可能会发生转换。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党组织资源整合力提升的“N型”发展路径和“S型”发展路径。联村党委资源整合机制在利益分配方面能实现长远发展和当前发展红利之间的平衡。由此,党组织资源整合能力提升下的乡村发展实践既面向乡村全面振兴,又高水平地有效推进了新型城镇化。此外,联村党委资源整合机制的构建填充了公共权力和基层组织的“真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社会运行“失范”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妥善处理民主、集中与效率的关系。概言之,在联村党委机制构建过程中,对于市场产业的引入和农村资源的整合应同向而行,同时应以党委制度整合的方式予以进行深度嵌入,落实从外部输血到内部造血的乡村治理策略。

Market Cooperation and Non-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Innovation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Model with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ypo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Cases of the Party Building in the Joint Villages

Xian Mingxia, Zhou Yicheng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century shows that China's model of grassroots autonomy is a practical example of the development miracle brought by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the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model run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from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the state to the independent governance in rural communities. A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novation of grass-roots autonomy,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joint village party committee is not only the combination of village boundaries, but also the governance combination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localization, market cooperation and non-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embedded in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s a more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integrating rur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the continuum of market cooperation and non-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variables, 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resource integration modes: “village-village joint”, “strong-weak village coalition”, “village resource interconnection” and “village industrial traction”. The practice of the four resource integration modes and the typical case of the party building in the joint villages shows that the mechanism of joint village party committee is essentially an innovation mode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grass-roots aut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ability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mprehensively optimize and integrate the rural resources, and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united party building; market cooperation; non-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 陈浩天]